



# 金雄白與《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 「讀人閱史」之五

蔡登山 ◎ 文字工作者

金雄白是位資深的報人，他以朱子家的筆名寫過《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書而轟動一時。他一生充滿傳奇，他曾說他是一個道地的「馬浪蕩」，那是意謂一個人曾從事多種職業，但終究一無所成。他說舉凡士、農、工、商、兵，他樣樣都幹過。其中新聞記者和律師，勉強可算躋於士人之林；他也曾經在南京對岸江浦縣境的九袱洲，開闢過一個大農場，從事墾植，由於糾紛重重，搞了兩三年就關門大吉。另外在二十餘歲時，就與友人在上海楊樹浦開辦過一家人造絲的織綢工廠，以後又與謝克明合辦過一家規模巨大而又為中國第一家出品陰丹士林布的仁豐染織廠，同時還創設過一家赤燐廠。在商業方面，又開過銀行、錢莊，經營過鹽務、貿易等規模不小的公司行號。甚至還客串過短時期軍人生活，穿起一身軍裝，符號領章，式式俱備。他說他自18歲踏入社會後，五十餘年來，塵海浮沉，逍遙浪蕩，經歷了各種不同的境界，也嚐盡了人世間甘苦的況味。

金雄白（1904—1985）為江蘇青浦（今屬上海）人，原名焄民。父親童年也曾過著席豐履厚的生活，後來家道中落。父親對於洋學堂，總認為是誤人子弟，後來才同意他入小學。金雄白後來在《記者生涯五十年》一書中回憶說：「那時入學考試既不嚴格，而且在小城中更有人情可託，我就輕易地跳過了初小而進入高小一年，到了民國6年（1917）14歲那年，也居然混到了高小的一紙文憑。」小學畢業後，他進入太倉縣的江蘇省立第四中學就讀。中學畢業後，他考入上海總商會。1925年6月因擔任《時報》總主筆的伯父金劍華之薦到《時報》任練習校對之職。《時報》於1904年由狄楚青所創辦，1924年由黃伯惠所接辦。他接辦以後，力仿美國赫斯特的作風，著重社會新聞與教育新聞，首用套紅標題，大量刊載圖片，在上海報業中掀起另一高潮。他敦請金劍華（詠榴）出山主持筆政。金劍華為光緒癸卯舉人，曾讀於南菁書院，舊學新知，根柢甚厚。歷任《申報》、《新報》、《中外日報》主筆。在新聞界，亦屬元老資格。兩個月後，金雄白升任助理編輯，最後更由專訪政治新聞的外勤記者而擔任了採訪部主任。

就中國新聞同業內部的組織與人事言，《時報》實為設有採訪部的第一家；而金雄白為出任採訪主任的第一人。他與本埠新聞編輯吳靈園悉心規劃後，《時報》乃以社會新聞而創下極高的銷售量。其中金雄白第一次出馬採訪的是上海美術專門學校選用妙齡女郎作為「模特

兒」，在眾目睽睽之下，袒裊裸裎，一絲不掛，擺出各種姿態，作人體寫生。這當時引起輿論譁然，以「藝術叛徒」自居的該校校長劉海粟，甚至被五省聯帥孫傳芳下令捉拿，要予以槍斃。金雄白的這則報導，在當時是一紙風行，萬人爭誦的。他第二次採訪的為上海市地方法院審訊「石女」離婚案，當時法院院長鄭毓秀，以事關風化，禁止旁聽，拒絕記者入席。金雄白以此案應屬生理問題，與風化無關，與鄭毓秀相互辯論，終於得入採訪。就案情本身而言，不添花巧，已是引人入勝了。妙的是金雄白還不用白話寫，而依照原告的浦東話寫。原告是浦東農民，土語村言，想到什麼說什麼，有時還夾雜當地的鹹濕語，不知避忌。這些供詞都被金雄白如實地照錄，他以白描工夫寫出閨房奇情，連名主筆陳冷血都認為有《金瓶梅》的筆法。也因此他有陣子即以「瓶梅」為其筆名，合上他的姓氏，倒可說是天造地設。

1927年金雄白採訪戰地新聞，被軍閥孫傳芳部隊截獲幾遭砍頭。1928年底被辭退，在《時報》前後三年半。1929年春天在浙江省民政廳當過一個月又十二天的小公務員。同年夏天任陳立夫在南京創辦的《京報》的採訪主任。同年8月，蔣介石前往北平會晤張學良和閻錫山，金雄白曾隨節在南京往北平的火車上採訪蔣介石，當時蔣的隨員有：孔祥熙、吳稚暉、熊式輝、趙戴文、陳布雷、邵力子、周佛海、戴笠等。金雄白回憶當時的情景說：「我們的這一節車，前面也有一間大客室，每當晚飯以後，蔣氏也總過來與大家見面，小坐閒談。因為那時各報的外勤記者，只有寥寥數人，而且採訪謁見，也遠不如以後的嚴格，所以蔣氏對於我們自然是熟悉的。車行的第一天，他過來一看到我，就笑笑點頭，接著環視了車中各人後問我：『都相識嗎？』我指指一個不修邊幅而外形像是小學教員的那一位，搖搖頭，表示並不相識，蔣氏就為我介紹說：『他是周佛海』。哪裡會想到經過這一次介紹之後，我與佛海就成了往來較多的朋友，也且因他之故，便改變了我後半生的全部命運。」和周佛海的結識，為其日後投靠汪政權埋下伏筆。

1930年春，他就任南京《中央日報》採訪主任。1931年擔任上海英文《大陸報》、《時事新報》、《大晚報》、《申時電訊社》四社駐京聯合辦事處主任。在四社前後大約一年。1932年春天起，接受潘公展所創的《晨報》之邀，擔任該報開辦時的採訪主任，前後為時也僅有半年。之後金雄白還辦了個通訊社——「大白新聞社」，前後一年有餘，於1934年關門大吉。這期間他混到持志學院的文憑，於是去請領律師證書，在上海南京路上大陸商場開業當律師了。

金雄白談到他當律師的情況說：「我執行律師的第一個時期，係自1934年春以迄1939年秋，前後有五年多的時間，除了最初一星期內，門庭冷落，仰屋興嗟而外，以後的幾年，居然應接不暇，有疲於奔命之勢。記得有過一個月中，出庭達七十餘次的紀錄。這並非我真有什麼本領，而是種種因素湊合起來造成了僥倖的局面。首先，開業時各報全版封面的那個大廣告，畢竟發生了相當效力。其次，我自信多少有一些負責精神，逢到開庭，一定準時而到。因任何一個當事人一旦涉訟，動輒有關身家性命，乃視律師為唯一靠山。審案開始了，如還不見律師



的影蹤，就會惶惶如也，如大禍之將臨。我知道他們的心理，儘量做到不使當事人有焦急等候的情形。還有，訴狀是寫得越長越好，庭上發言是越多越好，短小精悍的訴狀，要言不煩的辯論，會被認為未盡全力，也儘管言多必失，或會弄巧成拙，但有幾個當事人是深通法律的？再有，我一生對金錢向不斤斤計較，而最初委託我辦案的，總是些非親即友，公費開多了，豈非認識了熟皂隸，反而要打重板子？就覺得難於出口。但要少了，又覺得寥寥之數，就不如賣個人情的好，因此談到公費，很多是堅拒而樂於義務辦理的。不料太多親友受此小惠，就一直銘記於心，以後知道有人要涉訟，就為我百許拉攏，以為報李之謀了。」

金雄白在1939年經周佛海之慫恿，正式下海加入汪政權，出任中央政治委員會法制專門委員會副主委，並列名周佛海（財政部長、警察部長兼中政會秘書長）手下心腹「十兄弟會」。金氏在汪政權中，頭銜看似不錯，其實甚少政治權力，其主要任務還只是辦報和辦銀行。

1940年3月30日，汪偽政權成立當天他在南京創刊《中報》。董事長周佛海，社長羅君強，他擔任副社長，總編輯由關企予、張慎之、倪蝶蓀先後擔任。社址在南京朱雀路111號。關於《中報》的名稱，羅君強說：「報紙取名《中報》，對人公開說它是中國人辦的報紙，『中央』辦的報，實際上是我看到《申報》在上海資格最老，一般人對它印象很深，『申』字去掉一橫就是『中』字，命名《中報》，有心影射。」學者經盛鴻指出，該報創辦時，闢有「慶祝國民政府還都特刊」，汪精衛等偽政府首要題詞祝賀。該報在〈發刊獻詞〉中稱：「中報者，中日永久和平紀念之產物。……無和平運動則無中報。……今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創造歷史上之一重大紀念日。一元復始，萬象更新！」該報初時日出對開一張半，後擴充為兩大張；1942年縮為對開一張。由於該報重視版面，且在南京、上海間自設電臺通訊，將西方各通訊社的電訊稿改頭換面地擇要刊登，顯得新聞內容豐富、及時，故銷路順暢。至日本投降，該報才終刊。

《中報》創刊3個月後，金雄白又陸續發行了《週刊》與《譯叢》兩份雜誌。1940年夏天，金雄白結束《中報》的職務，回到上海，創辦《平報》。《平報》前身是《文匯報》，國軍西撤後，《文匯報》停刊，丁默擘忽然動興予以收買，先後委任了穆時英與劉吶鷗為社長，正籌備出版之際，兩人又先後為重慶特工所暗殺，至此丁默擘無意刊行，於是以順水人情送給周佛海。當時金雄白正在南京一面創辦「南京興業銀行」，一面主持《中報》業務。但周佛海身邊全無可以辦報之人，於是他要金雄白將《中報》交給羅君強，要他回到上海辦《平報》。

金雄白形容那是在炸彈與手槍下辦報，他說：「在《申報》記者金華亭被殺後，在當時一對一的報復原則下，我成為最有可能的目標。那時我雖已置備一輛防彈的保險汽車，隨身又帶了兩枝槍，一在外衣的腋下，一在公事皮包中，更穿上了鋼絲背心，但還是終年蟄居在內。偶爾必須外出，事前絕不讓任何人知道，臨時驟然出發，還帶了四名保鏢，前呼後擁，像是押解江洋大盜。……所到之處，也絕不停留至半小時以上。但終於報館在門外被投擲過兩次炸彈，



機器房內，還被人帶進了化學燃燒劑放了一次火，前後遭遇五次危險，都能僥倖死裡逃生。」

《平報》在1945年6月停刊，這期間金雄白同時還創辦一份小型四開報紙，名為《海報》，該報內容絕不談什麼「和平運動」，更不談什麼「大東亞聖戰」，當時寫稿的人可說是集一時之選，長期在《海報》撰稿的有陳定山、唐大郎、平襟亞、王小逸、包天笑、蔡夷白、吳綺緣、徐卓呆、鄭過宜、范煙橋、謝啼紅、朱鳳蔚、盧一方、沈葦窗、陳蝶衣、馮鳳三、柳絮、惲逸群等，女作家中，更有周鍊霞、陳小翠諸人。當時上海還有不少小型報存在，但以《海報》銷路大，內容又較為特出，水準在其他各報之上。

汪偽時期，汪政權政治活動中一些無法公開的經費，很難處理，需要開設一家銀行來秘密走帳，金雄白遂搖身一變成了偽南京興業銀行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後來又擔任中國實業銀行的常務董事、蘇州商業銀行的董事長，還有許多商業銀行要他擔任名義。金雄白說：「儘管我看懂營業上的日記表，連什麼借方貸方也分不清楚，但既然能身兼那麼多『要職』，在那時，有誰敢否認我不是一個『銀行家』？因此，有時候我會笑我自己，也想到有些居高位呼風喚雨像是煞有辦法的人，恐怕不少正同我一樣，不過夤緣時會欺世盜名而已。」

日本人投降後，他毫無例外地被當成漢奸投進了監獄，財產遭籍沒，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後法院以他「協助抗戰，有利人民」，減刑為兩年半。金雄白回憶說：「1945年的10月2日，我就去自投羅網，難得嚐一嚐以身試『法』的味道，經過了九百十二天的羈囚生涯，至1948年的4月1日，又復重見天日。論時間，這兩年又半的歲月，像是對我成為一大浪費，但也不是全無收穫的：讓我更體味到什麼是政治；也給我增添了人生難得的經驗，更由此而知道什麼叫人情冷暖與世態炎涼。」

1948年10月9日，金雄白搭機赴臺灣，在臺灣只停留一宵，翌日就匆匆轉飛香港，在香港住了一兩星期，覺得無聊，又束裝回滬。1949年眼看中共長驅南來，在2月間，也就是農曆元宵節過後幾天，他不得不拋妻別子，再度避居香港。第二次到香港，前後一共住了8個月之久。1949年11月中，又搭船經天津、北京，返回上海。金雄白說：「這次我重回上海，劫後餘生，正像一隻驚弓之鳥，再蠢也不會捲入政治漩渦，本意只在與家人團聚，安分守己，共渡餘年，況且家中四壁徒存，連日常生活，且不知何以為計，更遑論其它了。詎知當局以我的突然歸來，也總以為或有不軌之意，在以後的短短數月之中，就不時用種種方法，直接間接地向我試探，使我慄不自安，終日惶惶然深恐有朝會禍遭不測，前後住了九個月，最後還是出於遠走高飛一途，竟不得不在將死的晚年，渡其流離漂泊的生活。」

他第三次再到香港，到港後，金雄白先是還不改在上海的派頭，經常流連咖啡館舞廳，出手豪闊，但坐吃山空，看看不是長久之計，遂在「不學有術」的報界奇人陳彬龢的慫恿下經商。陳彬龢糾集了一幫南逃到香港的失意政客和商人合夥，其中就有後來騙得金雄白差點跳海的盛宣懷孫女婿，也是上海灘「花國大總統」富春老六的前夫周文瑞。金雄白因辦過銀行，被



公推為總經理，這幫人都不是經商的料，而且彼此拆臺和猜疑。陳彬龢聯繫了戰前曾做過日本駐上海副領事的芳村做中間人，異想天開計劃從日本購買戰略物資出口給韓戰時的中共，可金雄白實在無此膽量，只願做平常貿易。由於經營不善，全軍皆沒，公司最後倒閉時，金雄白把所有的積蓄都填了進去，才還清了欠債。金雄白說：「這是在我一生過去五十餘年的歲月中，從未遭遇過的困境。在日夜煎熬之下，140磅的體重，一月之間，竟低跌至108磅。想不到那個瞎子為我算命時所說要當心還有一次颶風的尾巴，竟然那樣猛烈地吹襲。茫茫大地，竟使我有何處容身之感。」

生意失敗後，囊中無錢，生活無著，因支付不起租金，住處也越搬越小，到最後無處棲身而不得不寄人籬下。謀生無術，身無長物，終於在貧病交迫中不得不靠賣文療饑。1954年，金雄白終於重操舊業做了陳孝威的《天文臺報》的主筆。雖說是主筆，但主要的工作只是給報紙補白，長篇大論的文章自有陳孝威親自操刀。為稻梁謀，金雄白說：「那時我也是真在賣命。由於營養不良，心境太壞，低血壓已到了危險邊緣。有幾次正在社中寫稿，忽覺天旋地轉，搖搖欲墜，因稿未成篇，不便擲筆而走，只好一手撐著頭，一手握著筆，照常趕寫，等寫完了才搖搖晃晃地扶牆摸壁而歸。也有時臥病在家，發著高燒，為了不願脫稿，擁被坐在床上，將木板放在膝蓋，到勉強寫成爲止。世間無如吃飯難，也總算讓我真正的體會到了。」金雄白在《天文臺報》不管政論隨筆、新聞時評、人生感嘆和零星回憶，無所不寫，這些文章後來結集成《亂世文章》五冊，《黃浦江的濁浪》一冊，《春江花月痕》一冊。

1957年，曾和金雄白在《天文臺報》面對面坐同一張寫字臺的另一撰稿人，也是陳孝威的連襟姚立夫，計畫辦一個掌故類的半月刊，這就是後來在香港延續幾十年的著名掌故刊物《春秋》。金雄白受姚立夫的攬掇，從1957年8月起，在《春秋》上連載《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金雄白提到姚立夫提議要他寫出汪政權這一幕的經過，說：「我雖然早已想記述這一件曾經親身經歷過的往事，而一直躊躇不敢動筆，因為不論就地位、學識、見聞而論，自己對此毫無信心。其次，那時我只與周佛海因私人友誼而較爲接近，所知道的還是一角而非全面，尤其當1950年倉皇來港時，片紙隻字都未曾帶出，雖然曾經保存了我所主辦的《中報》、《平報》與《海報》的全份，以及有兩箱完整的照片，臨走時爲免拖累家人又予以銷毀了，事隔多年，很多事就已有模糊彷彿之感。再則，要寫，是爲了向歷史作證，就應力求真實，指出某一事的始末，寫出某一人的真姓真名，但在香港還有不少汪政權中人健在，不容我胡說，如下筆稍不留神，更會發生是非恩怨。所以對立夫的提議，先曾力加固拒。而他卻一再以此爲言，終於因兩個原因而使我動搖了！因爲每一期要我寫一篇，既然朝夕相見，是逃也逃不了的，但又哪裡來這麼多題材？更重要的一點，則是我失算了。我知道立夫籌來資金的微少，也看到內容的蕪雜，以爲三五期勢非夭折不可，如此，那篇稿還未寫到本題，就會隨而中斷，於是違反了最初的本意，就糊里糊塗開始撰寫了。當第一次交稿給他時，爲了興趣索然之故，既未裝上篇名，

也未決定用何筆名，不料出版之後，才看到他竟然為我代裝了『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那樣不倫不類的題目，又為我起了『朱子家』這個筆名，真使我啼笑皆非，但黑字印在白紙上，事已成事，要改也無從改起了。」

登載的文章於1959年7月始陸續刊行單行本，1964年2月全書四冊殺青。數十年間，再版五次之多，並於1960年翻譯成日文。以後作者又不斷增訂和補充，以《汪政權實錄》合訂出版，1965年合訂精裝本再版後，改為《汪政權始末記》。這套書出版後，在華人社會裏一紙風行，在海外引起很大的轟動。

學者胡志偉認為「這部七、八十萬字的長篇回憶錄，是研究汪政權的第一手史料，在系統研究汪偽史的領域，比大陸與臺灣的學者起步早幾十年。雖然內容不乏自我吹噓隱惡揚善之處，其定位也局限於『一家之言』和『片面之辭』，但歷史的真相正是必須在無數的片面之辭中組合發掘出來。金雄白的漢奸身份容或會有爭論，但他保存與發掘汪政權史料的功績則是不容抹煞的。」然此書的缺點在於因為在刊物連載，大多是急就篇，沒有統一的大綱；綱目之間纏結凌亂，敘事前後倒置，內容多有重複，文字也比較拖遝。金雄白在書中的自序也說道：「在連續寫作期內，因為忙於筆債，事前既沒有預先擬定一個大綱，更以記憶力的減退，參考資料的全付缺如，事實上連一個大綱也竟然無從立起。到每期《春秋》的最後截稿期，就隨便抓上一節往事，完篇塞責，所以前後每多倒置，次序也見凌亂。又因為我力求想做到信實，僅就我親見親聞的事實為根據，每以孤陋，失之瑣碎。假如有一天我還能重回故土，將以我的餘年，搜集資料，重為改寫，這只有期之於渺茫的將來了。這一本書，只能說是我參加汪政權的個人回憶錄，也是我流浪中的一份紀念，假如謬承讀者以史料相視，將會愈增我的慚愧。」

《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連載完畢後，金雄白又根據在日本遇到川島芳子（金璧輝）的胞兄金鼎志的口述資料，寫成〈肅親王與川島芳子女兒〉，後來出版單行本，改名《女間諜川島芳子》。

1960年9月《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在日本「時事通信社」的「世界週報」上連載完畢之後，出了單行本，改名《同生共死之實體：汪兆銘之悲劇》。而因有此淵源，金雄白被該通信社聘為駐港特約撰述員，前後達十一年之久，並每年幫他們寫一本書，所以金雄白在日本出版的書，有《中共之內幕》、《中共之十大問題》、《中共之外交問題》各一冊，《中共之經濟問題》上下冊，《文化大革命》三冊，每冊字數都在二十萬言以上。又因時事通信社的關係，接受「內外情勢調查會」暨「外交知識普及會」的邀請，自1961年起至1967年止，每年一次到日本作巡迴演講，自1968年至1971年的四年間，又改為每年春秋兩次，足跡遍及東京、大阪、京都、神戶、名古屋、橫濱、前橋等各大都市。

1971年5月30日應聘於日本「時事通信社」，離開香港抵東京，但僅經過三個月的時間，就脫離了工作十一年的這家外國新聞社。從1971年9月至翌年9月，整整一年，金雄白並無工作，



成爲一個異國的無業遊民。之後因長谷川才次另行創辦一家「內外新聞社」，要他爲該社出版的各種刊物，撰寫一些稿件，稿酬以外，既不必到社辦公，另外還可以坐領乾薪。

1973年9月30日他返回香港，應姚立夫之邀，擔任《港九日報》副社長兼總編輯及總主筆三職。但爲時極短，金雄白說：「僅僅經過幾個月，自己覺得我對《港九日報》是一件道地的廢物，即對立夫來說，也徒然增加他一層精神的負擔，知難而退，乃毅然於1973年11月，上呈請辭，信內有兩句表明我態度最重要的話說，是：『爲盡友誼而來，爲全友誼而去。』」於是1974年3月14日，他再度踏上日本的國土，回到「內外新聞社」，每月爲「世界與日本」週刊寫一兩篇有關中共問題的專論，每月另外單獨撰寫一份「中國觀察」單頁，有時也寫印一二萬字的小冊。

1974年他的《記者生涯五十年》開始在香港《大成》雜誌第10期連載，迄於1977年6月的第43期爲止，前後達兩年又十個月之久，共68章，幾近三十萬字。金雄白認爲那只是一部浮生雜記而已，他說：「七十餘年的歲月，一彈指耳，回念生平，真是如幻如夢如塵，在世變頻仍中，連建家毀家，且已記不清有多少次了，俱往矣！留此殘篇，用以自哀而自悼，笑罵自是由人，固不必待至身後。」

1985年1月5日，金雄白病逝日本，終年81歲。他曾說當他在青壯之歲，寄身於全國最繁華的十里洋場，恣意愜心，優遊度日，一切紙醉金迷之地，鶯啼燕叱之場，幾無日沒有他的蹤跡。在同一時期他僱有三位名廚烹調，擁有五輛汽車代步，可說是席豐履厚。抗戰勝利後，因「漢奸」罪名，讓他身受縲絏之災，而家遭籍沒之痛。而在1952年在香港因經商失敗，3年中不僅饕餮難繼，也遭盡了親友的白眼與詬辱。他的一生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傳奇。

### 延伸閱讀

- 朱子家著（1959-1964）。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香港：春秋雜誌社。
- 金雄白著（1975）。記者生涯五十年。香港：吳興記書報社。